



"神树"下的誓言

张炳春

岁月更迭中的"红色书院"

徐佳佳

近代江西,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不仅较早产生了多次重要的革命运动,还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同时,作为红色中华的摇篮,苏区时期江西还建立了大量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为什么江西会成为近代革命的重要阵地?除去政治、地缘等因素外,江西书院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同样功不可没。

岁月不居,时光流转。随着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中国传统书院也迎来了巨大变革。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

此次书院改革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但历史的潮流终未能阻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再次下诏重新开展书院改革,中国书院文化逐渐向现代学校转型。

江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书院大省,不仅起步早,且数量多、影响大。根据江西各类地方志书、家谱及相关文献统计,江西历史上曾经有各类书院1959所,位居各省之首。以白鹿洞书院为代表,鹅湖、白鹭洲、象山、豫章、华林等江西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乃至教育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清末书院改革对江西教育发展影响巨大。这次不只是让大批江西书院换了名字,更让江西书院从学制、教学宗旨和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改革后的江西书院逐渐传播现代思想和文化,成为培养现代知识分子的摇篮。近代书院不仅是江西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还给探索救亡之路的近代江西学子打开了一扇窗户。

从时间上看,江西书院与革命的对峙,以及江西传统书院向"红色书院"的转化,始于清末书院改革后。在大革命时期和苏区时期,传统书院助力革命发展的作用最为凸显。

从地理上看,江西的"红色书院"主要集中在上饶、吉安、赣州及九江等地,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不谋而合。

可以说,近代革命铸就了江西的"红色书院",而江西传统书院向"红色书院"的转变,则是我国传统书院文化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以文化人、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韧性的体现。

从书院到学堂:红色书院传播现代思想,点燃革命火种

在近代传统书院的变革中,大量书院顺应时势变化,在教学体制和内容上积极转变。宜春铜鼓县的奎光书院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当地的客家民众集资建立。客家人善于变通,与时俱进的品格使得奎光书院在清末民初发生了较大变化。奎光书院不仅积极调整学制,还传播大量现代思想文化,促进了江西近代社会的发展。

近代革命志士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上饶横峰县的岑山书院又名岑阳书院,该书院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由时任知县谢阳光创办。在清末的书院改革中,岑山书院积极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点燃了当地革命的火种。1919年至1922年,江西



早期革命者黄道与袁玉冰等一起创办了"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回到家乡横峰县,积极开展革命宣传。1925年7月,黄道等利用岑山书院在当地的影响力,在岑山书院创立岑阳学会,出版《岑阳月刊》,向书院学生和当地群众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对之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学生到战士:红色书院培养了革命人才

清末民初,大量在江西书院接受教育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积极参加和组织民主运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发展,是拯救中国的一条可行之路。在完成书院的基础教育后,不少学生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革命时期,铜鼓县成立了赣西北第一个中共支部,其中的5名成员,有4人是奎光书院的毕业生,即中央苏区河西道委书记兼政委陈葆元,中共铜鼓县首任县委书记陈逸群,铜鼓农民运动领袖李建康,北伐功臣赖益躬。他们均是在奎光书院接受了现代思想启蒙后,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

寻乌县的石溪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时任知县绍锦江借用学宫厢房创办。石溪书院是寻乌县重要的教育场所,在近代教育变革过程中,为赣南革命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1927年,中共寻乌党组织联合时任石溪书院(石溪学校)校长曾有澜,将石溪学校改为中学校。曾有澜曾为国民政府国会议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曾有澜的思想转向革命。1924年7月,曾有澜与同乡共产党人廖摩汉等创办宣传进步思想的《寻乌》杂志,同时在寻乌县积极开展革命运动。任石溪学校校长之后,曾有澜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在当地名声大震,学生人数激增,该

校成为寻乌革命力量的大本营,为之后的革命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1928年3月25日,中共寻乌党组织以中山学校师生为骨干发起暴动,攻克县城,赣南革命开始星火燎原。

从书院到战场:红色书院提供革命场所

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战争环境和经费、人力不足,新建指挥所等公用设施十分困难。于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建筑,并将其改造为革命所需场所成了通常之举。江西书院文化浓厚,20世纪20年代仍有大量规模宏大、建筑齐全的书院,为红军解决战时所需场所提供了保障。红军所到之处,许多书院被改造为红军军事指挥所、红军医院和学校,成为革命发展的重要阵地。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为寻找中国革命出路,中共中央决定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辗转来到修水县,驻扎在凤城书院。同年9月9日,秋收起义在修水打响第一枪,修水县城升起第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军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此诞生。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经三湾改编,抵达宁冈古城,并在联席会议上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讨论开展武装斗争及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问题,对革命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兴国县的濂江书院坐落在濂江之滨,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濂江书院规模宏大,由门庭、讲堂、拜亭、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等建筑组成,是江西四大书院之一。1927年,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在濂江书院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并主办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1930年,书院成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毛泽东在该书院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安远县的永兴书院拥有浓厚的红色基因,1929年革命先烈的罗波波曾在书院召开军事会议,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在车头打响了安远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1933年,安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炎,率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从县城转移到永兴山,以永兴书院为临时办公室,并组织了版石和车头战役,打垮了敌人多次围剿。

此外,1927年10月,中共井冈山前敌委员会、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将位于井冈山市茅坪茅坪村村口的攀龙书院的三楼作为办公楼,其下的一、二楼设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所红军医院。石城县高田镇田心村鳌峰书院则在中央苏区时,被改造为红军后方医院。之后的1934年,赤水县苏维埃政府也选择在书院办公。

从书院到战场,江西书院不断注入红色基因。

从古树书院到红色遗迹: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时钟走过百年,历经战火的洗礼,江西书院逐渐从传统教育中退场,转身成为一处处革命遗迹,在世人的瞻仰中,诉说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200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将濂江书院列入全国第二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5月,濂江书院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毛泽东旧居和办公旧址,濂江书院至今仍保存有毛泽东当年用过的旧物。这些无声的遗迹就像时光机一样,将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中国农村情况,晚归秉烛读书,制定《兴国县土地法》的情景,一一再现。在这里,人们仿佛仍然可以听到十万兴国男儿争当红军闹革命的响亮誓言。

凤城书院现为修水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来到这座书院,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的厅堂上,仍整齐地摆放着一溜桌椅板凳,桌上放置着日式茶壶、陶瓷土碗、煤油马灯之类的原物。凤城书院正堂上首的墙上悬挂着鲜艳的红旗,上面赫然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另一面墙上,绘着红



色箭头的是秋收起义作战地图。生动的场景,诉说着从未远去的革命历史,"秋收起义举义旗,霹雳一声暴动"的革命激情,仍将鼓舞人们继续前进。

红色标语作为革命历史的见证,是当代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革命时期,红军大量驻扎的江西书院较为完好地保存了大量红色标语。

1927年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浏阳工农义勇队(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优秀青年先锋队第三团)进驻铜鼓,该团优秀营驻扎在奎光书院。驻扎期间,部队在奎光书院内书写了"南昌暴动"等革命标语。

1928年,平江起义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多次转战铜鼓,红五军政治部驻扎在奎光书院期间,在该院的院墙上又写下了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土地政纲等宣传标语。除此之外,整个书院的内壁、外墙上还有"红军万岁""打倒土豪劣绅""工农红军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反动派"等大量红色标语。奎光书院红色标语数量较多,保存较为完好,作为革命遗迹,这些红色标语仍然启迪着人们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

当古代书院与现代革命相遇,江西书院并没有从历史中退场,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为近代革命的发展提供思想、人才、物质等助力,在血与火的交织中,铸就一座座江西"红色书院"。



晚年的李桂英

村子大路旁的那棵古罗汉松,早已成为村民心目中的"神树"。一年又一年,古树在村子那片山坳地里静静地矗立着,饱经风霜,挺拔伟岸,枝叶繁茂,是村民们出发和回家的方向标。

这里是赣州市会昌县麻州镇齐心村,村民以邹姓为多,邹氏老族谱里记载着这棵古罗汉松。村民邹爱林翻阅爷爷留给他的这部族谱,恍然间,这棵神树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爷爷亲口告诉过邹爱林,"神树"是一棵野生的古罗汉松,在大爷爷小时候这棵树就很有名了。太爷爷当年参加红军举行仪式以及北上转移分团集结,都在这棵树下。

太爷爷名叫邹土先,因为五行缺水,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别看名字这么土,却是远近小有名气的铁匠,打出来的镰刀深受欢迎,轻快锋利且耐用,而且还不生锈。太爷爷一年四季都理平头,五大三粗,皮肤黝黑,村民都习惯称呼为"打铁佬",他也乐意别人这么叫他,也许这个花名有广告效果吧,帮别人打一镰刀或菜刀,能赚上一升竹筒的糙米,一升约1斤8两。

红军扩大队伍特别需要会打铁的穷人,正是由于有好手艺,打铁佬邹土先被区委书记李桂英惦记着,成了首批重点"扩红"对象。李桂英是名女区委书记,还兼扩大红军突击队副队长,为了提高"扩红"成效,经常刻意多与青壮年交往,一有空闲时间就帮助他们家干农活,照顾小孩,也多次特意帮助邹土先打铁,次数多了,"打铁佬"的老婆觉得不太高兴。

李桂英原名叫李桂洪,是邻县寻乌过来的女红军,一米六多的个子,身材高挑,面容姣好,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笑起来脸上藏着两个浅酒窝,非常有亲和力。加上能说会道,很有亲和力,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加红军的"扩红"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扩红"工作特别有成效。为此,李桂英成了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苏维埃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可偏偏这位重点"扩红"对象邹土先老是不上道,一听到当兵的事就将话题开或者干脆一言不发,他是父母中年才生的独生子,结婚成家6年,女儿5岁,儿子刚满2周岁,三代男丁单传,"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根深蒂固,只想把铁打好,本本分分过自己的日子。

邹土先从爱人欧招娣的口中得知,李书记不满4岁时父亲

就病死了,她的母亲在改嫁前将她卖给一个铁匠的家庭当童养媳,吃了很多苦,年纪不大就学会了全套农活,在家做豆腐、做饭、帮打铁,在外犁田、耙田,里里外外样样手巧。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李桂英听了红军首长朱德的演讲之后就参加了红军,随后跟着队伍走到麻州,能干而又开朗的她,二十岁出头就成为区委书记。难怪她帮别人打铁的时候,女孩子的动作居然这么熟练,"嗒嗒,嗒嗒"的落锤节奏这么和谐……

想到李书记年纪不大就吃了这么多苦,现在还处处帮助他们,为穷人着想,打铁佬邹土先总算有点动心了。妻子欧招娣看到村里大多数青壮年男人已经参加了红军,觉得丈夫留家里也没面子,于是也劝丈夫当红军。

可是,邹土先还有顾虑,转念一想,万一自己出去打仗回不来,或者战死了,老婆不就嫁给别人了吗?孩子不就要遭受大罪吗?不行,还是不行!

夜已静,妻子欧招娣看到丈夫辗转反侧,知道他有心事,就百般温情地安慰他。这时,邹土先看着妻子,突然问:"你要答应俺,俺参加红军去打仗,没回来的话,你不能改嫁,一定要等俺回来,要好好照顾孩子,把孩子们养大……"邹土先说得斩钉截铁,容不得否认。

"好!俺发誓,不管你在哪里,俺都守你一辈子!都把孩子们养大。"欧招娣的回答没有半点迟疑。

第二天,邹土先加入了红军队伍,一共12个人参加的入伍仪式,就在神树古罗汉松旁边的空地举行,红军"扩红"突击队队长、麻州区委书记李桂英作了深情的动员讲话。

两个月后,邹土先离家随部队出发,也在"神树"旁边集结,却从此杳无音讯……

红军北上后,地主还乡团和白军疯狂反扑,实行"石头要过刀,扫把要过火"的报复措施。

欧招娣作为高岗红军的家属,受尽地主恶霸的凌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几次都想悬梁自尽。可看到嗷嗷待哺的孩子,摸摸正在肚子里孕育的新生命,欧招娣想起那晚对丈夫毋庸置疑的诺言,便忍辱负重,排除万难,一心守候丈夫归来。

邹土先离家的第二年春天,欧招娣生下了丈夫的遗腹子,为了纪念丈夫参加红军,欧招娣将孩子取名邹红生,可这个时候哪敢用"红"字?只好定名为邹洪生,他就是邹爱林的爷爷。

正是度日如年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孩子,生活更加艰难。两根精神支柱就像两条有力的左右脚,支撑着欧招娣的身躯迈步向前,一根是"丈夫一定会回来"的信念,另一根就是"一定要将孩子们抚养长大"的承诺。尽管最终没有等到丈夫的消息,但是欧招娣看到守着的3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特别是最小的儿子洪生十四五岁就长得魁梧壮实,也就放了心,觉得等候了丈夫邹土先一辈子,对得住当初的誓言……

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欧招娣病逝。

新中国成立后,邹洪生将名字改回邹红生。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运动席卷全国。1952年冬,18岁的邹红生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1953年夏天,《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胜利结束,邹红生随部队光荣回到家乡。3年后娶妻生子,一生生下5子2女,人丁兴旺,就像这棵"神树"一样,枝繁叶茂。